

◎ 本书由贵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近代贵州的儒學與文化

譚德興◎著

貴州大學出版社

◎ 本书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基金资助出版

近代贵州的儒學與文化

谭德兴◎著

貴州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文化 / 谭德兴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1126-159-2

I. 近… II. 谭… III. 儒家—文化—研究—贵州省—近代 IV. 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2353号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文化

著 者: 谭德兴

责任编辑: 钟昭会 肖 敏

设计制作: 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佳美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60×185mm

印 张: 14.5

字 数: 287千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159-2

定 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绪 言

近些年来,区域文化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区域文化研究的前提自然是该区域的文化存在较大的研究价值,能为该区域乃至整个民族当前或未来文化建设提供借鉴。贵州虽偏于一隅,但其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轻视的。特别是自明清以来,尤其是晚清时期,贵州文化曾有过辉煌的一页,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什么贵州文化能在明清以来逐渐突出?为什么在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贵州文化却大放异彩?贵州文化的发展演变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这些无疑都是研究贵州文化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某区域的文化发展之所以能产生巨变,肯定有很多复杂原因。但文化发展的内在积淀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无疑是两个最主要的方面。贵州文化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这两方面的原因。许多研究者往往习惯以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来审视某一地域的文化发展。若同样以之来衡量贵州文化,则有时会令人十分困惑。对于贵州这个地区来说,什么是本土文化?什么是外来文化?实际上要准确回答这些问题却并非简单容易之事。许多人习惯将贵州地区的苗、瑶、布依、侗、仡佬等民族文化称为本土文化,而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等称之为外来文化。但这些习惯性的文化划分往往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与验证的。我们今天所认定的这些贵州土著民族实际上大多是从外部迁徙而来的。我们并不排除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真正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例如,旧石器时代的观音洞文化,距今五六十万年。^[1]说明远在五六十万年前,贵州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人类生息、繁衍。此外,考古发现的“桐梓人”、“水城人”、“猫猫洞遗址”及“兴义人”等,^[2]又充分显示出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贵州都存在着较典型的人类活动遗迹。据这些考古发现不难看出,原始人类在贵州活动的地域范

[1] 1964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在黔西县沙井乡发现观音洞文化遗址。观音洞文化乃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重要代表。出土了四千件石器,包括刮削器、砍砸器等,多为打制石器。还出土了许多动物化石。从出土石器和动物化石看,当时观音洞人处于原始社会之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五六十万年。

[2] 桐梓人乃1972年考古发现于贵州桐梓县九坝乡。出土物有一个老年人的右上内侧门齿,一个青年人的右上第一前臼齿以及十二件石器。桐梓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火。水城人于1973年发现于水城硝灰洞,出土了一枚老年男性左上犬齿以及五十三件石器。水城人对火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猫猫洞遗址以及兴义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于1974年发现于兴义县顶效乡,1975年发掘。出土了四件下颌骨和三段股骨人类化石、四千多件石器以及许多精致骨器。它们是中国南方三种旧石器晚期文化类型之一。

围是十分广阔的。

但这些考古发现却难以直接与今天贵州大地上生活的少数民族相对应。因为在可考的民族关系史上，在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历史文献记载中，贵州地区的民族，其文化发展步伐与华夏文化相比较似乎并未落后多远。《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说：“贵州最早的居民当是濮人，其西为氐羌民族，其东为苗瑶民族，其南为百越民族，其北为汉族。”^[1]据《史记·周本纪》可知，周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髳、微、纁、彭、濮等诸侯国参与行动。《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说：“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纁、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史记正义》也说：“濮在楚西南……，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2]这其中的濮正是贵州最早的居民之一。《史记》无疑是最早记载贵州地区民族与华夏民族相互交往的文献之一。很显然，早在殷末周初，中国的西南、南部，特别是江汉之域都已成为周部族的势力范围，贵州自然也在周王室的势力范围之内。此充分说明，在殷末周初，贵州文化与北方的华夏文化已经融为一体。虽然这种交融局面的形成，肯定经历过漫长的过程，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可考文献中，贵州文化的发展起点似乎并不比中原文化晚。

若再往前推一步，中国的历史便进入神话传说时代。但即使从神话传说时代看，贵州文化的发展似乎仍然与华夏文化基本同步。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一曰：

外史氏曰：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鸿蒙不可得考，帝高阳氏化至交趾、流沙，远跨黔西南之外。唐虞命官勅治，时厝有苗。有苗氏者，缙云氏之后也。称苗者何？若曰“中夏之苗裔”云尔。时则有三危之戮、徂征之命。藉令非我服属，骛远略而勤之兵，帝者不为也。

既云贵州之民乃“中夏之苗裔”，则贵州文化与华夏文化之渊源关系显然难以人为地定出一个开启点。古代民族交往，文化融合显非今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贵州文化与华夏文化之互动也显非今人所认为的那样开启之晚。虽然从行政区划上，贵州一地与中土时紧时疏，但在历代帝王的天下观中，贵州显然从未被视为“异域”。

历来多有谓贵州即殷商时期的鬼方。如《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说殷商武丁时期：“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徐文靖《竹书统笺》卷六曰：

笺按：《后汉·西羌传》：“武丁伐西戎、鬼方。”《诗·大雅·荡》云：“内爨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鬼方，远方也。”《世本》：“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曰女嬪。”注：“鬼方，于汉则先零戎也。”要之，武丁伐鬼方，则鬼方自是国名，不得以远方槩之。《竹书》言伐鬼方，次于荆，大抵即《商颂》所云“奋伐荆楚”者也。孔氏《诗疏》曰：“周有

[1] 《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侯绍庄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2] 《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59年，第123页。

天下，始封熊绎为楚子。于武丁之世，不知楚君是何人。”今按彝器款式所载，《曾侯钟铭》曰：“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阳，楚王韵章。”薛氏曰：“背有两商字，《商癸父丁彝铭》曰‘惟王六祀’，《兄癸卣铭》曰‘惟王九祀’。商称祀也，商自太戊外，惟高宗享国五十九年，此钟铭称五十六祀者，应自高宗伐鬼方之后而荆楚亦远徙西阳也。”

徐文靖似乎认为鬼方乃荆楚。但既然《竹书纪年》将鬼方与荆并言，则二者显非一地。殷高宗伐鬼方而次于荆楚，则鬼方当在荆楚附近。故《明史·土司传》云：“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之属皆是。”^[1]道光《永宁州志》卷三曰：

永宁州，在《禹贡》梁州外境。殷为鬼方，周为荒服，秦属夜郎地，汉属牂柯郡，唐为戎州都督府、盘州及罗甸国地，宋为普里部，元宪宗时平云南，普里部归附置普定路（寻改为府），习安、镇宁、永宁三州至元十七年改罗氏鬼国，为顺元路，置宣慰司，二十年置贵州等处长官司，领于顺元安抚司，此贵州之名所自始也。

卷十《风土志》曰：

牂柯地多雨潦，俗尚巫鬼禁忌。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有小鬼主。由此言之，古称黔地为罗施鬼国，又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为鬼国也信矣！

据此可知，贵州之名实源自殷时之鬼方也。民国《贵州通志》说：

曹始能《贵州名胜志》云：“贵州所治，殷商之鬼方。”又云：“《宋朝纪要》以鬼方地林多贵竹，因以名州。”此宋人说也。元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记》亦谓：“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鬼方之境。”故嘉靖、康熙、乾隆诸《省志》皆云“贵州，殷为鬼方。”《清一统志》、《职方典》并同其说。^[2]

由于古人均一致认为贵州即殷商之“鬼方”，故民国《贵州通志》亦说：“黔在殷代，当为鬼方，故本志托始于殷。”^[3]或许，这种政治关系，最能解释贵州文化中的某些特殊因素。例如，民国《八寨县志稿》卷二十一《风俗志》记载水家“反书”：

[1] 《明史》，张廷玉等，中华书局，1974年，第7981页。

[2] 民国《贵州通志》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0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28页。

[3] 民国《贵州通志》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0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29页。

冰家反書

子又曰申

甲子乙丑

甲子乙丑金

壬申癸酉

壬申癸酉金

庚辰辛巳

戊辰己巳金

丙寅丁卯

丙寅丁卯木

甲戌乙亥

甲戌乙亥木

壬午癸未

壬午癸未水

戊辰己巳

戊辰己巳土

丙子丁丑

丙子丁丑水

甲申乙酉

甲申乙酉水

庚午辛未

庚午辛未土

戊寅己卯

戊寅己卯土

丙戌丁亥

丙戌丁亥土

辛又曰壬





辛子り丑兆

元黄収卯木

壬未分己水

甲午乙未金

丙申丁酉兆

辛未り亥木

元子収丑工

壬戌分卯金

甲未乙巳兆

丙午丁未水

辛申り酉工

元未収亥金

壬子分丑木

甲辰乙卯水

丙未丁巳工

辛午り未火

元申収酉木

壬未分亥水

又春夏秋冬

春曰元夏曰本秋曰非

冬曰本春曰吉凶曰凶月曰凶午時曰吉

这就是贵州著名的水书。当代许多学者认为,这种贵州文化中独有的“水书”直接源自殷商甲骨文,甚至有学者认为早于殷商甲骨文,可溯源于夏代陶文刻符。这从另一个侧面,似乎也印证了贵州实乃殷商时期的鬼方,与殷商王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但将黔纳入殷商之版图,实际上是通过漫长的征战实现的。故《汉书·匡衡传》说“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汉书·五行志》“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武丁恐骇,谋于忠贤,修德而正事,内举傅说授以国政,外伐鬼方以安诸夏,故能攘木鸟之妖致百年之寿。”《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后汉书·章帝纪》说“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后汉书·西羌传》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书纪年》说“高宗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祀,王师克鬼方,氏羌来宾”。正是由于有殷商以来,甚至更早的华夏文化向南拓展,故商末周初,贵州文化已经成为华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的一体化,疆域的统一决定了文化发展之间的基本同步。

因此,至迟自殷末周初始,贵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土著民族与本土文化了。严格意义上说,贵州文化已经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与其它地域文化发展一样,虽然这个分支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又不断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其始终是中华文化整体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研究贵州区域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的贵州,其文化发展臻至一个高峰。无论在史学、文学、艺术还是学校教育等方面均有质的飞跃。例如,从人才培养来看,道光年间贵州有进士九十五人,举人五百九十六人,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萧光远、郑珍、莫友芝等;咸丰年间有进士三十人,举人九十人,其中包括名臣丁宝桢。同治年间有进士四十五人,举人三百八十九人,其中包括维新大员李端棻。光绪年间有进士一百四十三人,举人七百零六人,其中包括状元赵以炯、夏同龢。^[1]另外各时期在贵州所取武科人数亦不少。人才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近代贵州人才之繁盛充分说明了近代贵州文化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儒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只有儒学获得一定发展,才能促使史学、文学以及学校教育等方面相应之发展。近代贵州儒学的发展繁荣是空前的。不仅出现了名震海内的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等,而且产生了一大批极富影响力儒学著述。例如,萧光远的《易》学研究著述、郑珍的《礼》学研究著述,莫友芝的目录学研究著述,宦懋庸的《论语》研究著述等均享誉海内。

儒学乃近代贵州文化繁荣之基础。正是由于儒学在近代贵州的广泛传播,方才带来贵州人才之兴盛,而人才之兴盛必然相应促进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巨大发展。

[1] 参阅《贵州近代史》,周春元、何长风、张祥光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贵州儒学发展概况.....	1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	1
第二节 魏晋至宋元时期	14
第三节 明清时期	17
第二章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史学.....	24
第一节 近代贵州地方志编纂体例的儒学内涵	25
第二节 从道光《思南府续志》看清代贵州妇女的贞节观	29
第三节 从光绪《铜仁府志》看近代的贵州妇女	38
第三章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文学.....	51
第一节 郑珍文学创作的经学化	53
第二节 黎庶昌散文中的儒家思想	60
第三节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文学批评	68
第四节 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之嬗变及其文学意义 ——兼论史学与文学之互动	77
第四章 近代贵州的经学发展及其成就.....	87
第一节 近代贵州经学发展概论	87
第二节 郑珍对日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之辨伪	90
第三节 近代贵州的经学著述	99
第五章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教育.....	149
第一节 近代教育变革与儒学之发展	149
第二节 近代贵州儒学传播与教育之发展	158

第六章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民俗文化.....	169
第一节 儒学与近代贵州民俗发展的多元化态势	170
第二节 近代贵州民俗文化发展演变之原因	209
主要参考书目.....	214
后 记.....	217



第一章 贵州儒学发展概况

儒学在贵州的传播史，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部民族文化关系史。贵州古代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源远流长。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

文化的交融无疑有各种方式。但对于古代的贵州地区来说，先秦两汉时期则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文化交融，一是征战，二是游学。先秦时期由于贵州与中土在政治归属上的时疏时密，故战争成为当时主要文化交融方式，而两汉时期四海一统，贵州在政区上已经归属汉家。天下一家，故此时的文化交融主要通过游学、问学、访学等方式进行。

古今中外，征战乃文化交融的一种主要方式。这点在先秦时期的贵州体现得尤为明显。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说：

贵州，《禹贡》荒服之地，殷为鬼方，周为靡莫之属，战国时，楚顷襄王遣弟庄蹻略地黔中，秦伐楚，遂以为黔中郡地，汉为西南夷地，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以是地分属牂牁、夜郎、武陵三郡。蜀汉为牂牁、兴古二郡地。……

此处史家简略描述了古代贵州与中土的发展关系。其中“略”、“伐”、“平”等字眼充分说明了先秦两汉时期贵州与中土文化的交融方式。早在殷商时期，商汤、殷高宗等便曾有多次对贵州的征伐。殷末周初，贵州的部族不但参加了推翻殷商王朝的激烈战争，而且对周初南国文化建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什么贵州会成为历代必争之地呢？万历《贵州通志》卷一云：

宇宙大矣！黔为西南一隅，宜不足当中原什一，然山经水纬，天地献其奇，重峦复嶂，造化佐其险。固荆楚之上游而滇南之锁钥也。

近代贵州的儒学与文化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曰：

东阻五溪，西距盘江。通都大郡，山经水纬。内藩楚蜀，外控蛮粤，为西南巨镇。据经楚之上游，为滇南之门户。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南至昆明，北极云梦，西抵瓯越，东及巴岷，千里山川，险阻充塞。

显然，从经济视角看，贵州对于古代各代政权似乎无足轻重。但从战略高度而言，贵州“内藩楚蜀，外控蛮粤”、“据荆楚之上游，为滇南之门户”，实乃西南巨镇。如此的战略地位，无怪乎贵州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郭子章《黔记》卷一说：“国之大事在戎。黔极西鄙，故纪黔事之大者十九戎也。”下面拟就文献所载的一些重要军事行动为例，来看看古代贵州到底是如何通过战争与外部进行文化交流的。

1. 周武王伐纣

商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发生了空前的历史巨变。这种巨变无疑是以周武王伐纣为转折点。《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事件经过：

武王左杖黄，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1]

《史记集解》云：“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髳、羌在巴蜀，纁、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史记正义》云：“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卢州、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2]据此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

[1] 《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59年，第122页。

[2] 《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59年，第123页。



改朝换代战争中，贵州的部族参与了其中。这是贵州部族主动向其它部族开战。战争的结果是，贵州成为周王室维护南疆的重要屏障。中原文化的辐射面已达贵州地区，贵州不但在政区上归属周家，而且在文化上臣服于周文化体系。贵州部族能够参与商周之际的历史变革事件中，说明贵州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交往已久，绝非开启于商周之际，也说明周王室充分注意到了控制西南、南方部族对于王室发展的关键作用。这一点从《武》乐之内容也可得到印证。《礼记·乐记》载孔子之语：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且夫乐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一待诸侯之至也。^[1]

商、周之际，社会政治发生了激烈深刻的巨变。经过一番血腥的刀光剑影，最终大邦殷商灭亡而西周王朝建立。周室在推翻强大的殷商王朝前，曾经过了长期而又耐心地蓄积力量阶段。在一系列的反殷准备工作中，周室十分注重发展同周边部族的友好关系，这也是周室伐殷成功的关键。在伐纣之前，周室与南方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便已存在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武》表现的是周武王伐商并建立西周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周室对南国建设的高度重视。在西周的建立和发展初期，南方诸侯，包括贵州地区的部族曾立下汗马功劳。当时的江汉之域实乃周家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基地。故《诗谱》说：“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化而从之。”^[2]撇开圣人德化等附会内容，“文王典治南国”充分表明殷末周初，周的势力范围已达南部广大地区。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说：“在江西和湖南的一些地方也发现了不少西周铜器。这些发现证明，周朝的势力和影响已经到达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和融合。”^[3]“周朝除了在黄河流域建立封国外，很早就向南方江、汉地区发展势力。如江、汉一带的庸、卢、彭、濮等方国部落随武王伐纣，说明双方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联系。”^[4]“周朝的势力和影响在西南达到很远的地方。在宗周西方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有周朝所封的散国，也是通往四川的要道。武王封同姓贵族于巴（今四川重庆北），是周朝在西南最远的封国，那里的巴、蜀等族都和周朝有同盟关系。四川的彭县和新繁都发现了商末周初的器物，

[1]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3页。

[2] 《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第264页。

[3] 《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9页。

[4] 《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1页。

可见商周文化在西南的影响了。”^[1]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南方部族与周王室密切进行着文化的交融活动。这种文化交融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南方部族文化被吸收进周之礼乐文化体系中。例如，周室对“南音”之吸收便是明证。《吕氏春秋·音初》云：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2]

《音初篇》从发生论探讨了四方风土之音“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的最初发生情况，并揭示了四方之音中，“南音”与周王朝的密切关系。其中南土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南音”似乎并非“南音”之源而只是“南音”发展中的一种特殊流变形态，因为在夏禹之前的帝尧、帝舜时期，南土已经存在丰富的音乐形式。但《音初篇》从音乐发生与传播视角，说明了“南音”的发生及其被采入北方周室的时间、采者和命名等情况，并第一次触及到“南音”北传问题。高诱注：“（南音），南方国风之音”、“取涂山氏女南音以为乐歌也”。^[3]高诱认为二《南》的“南”实乃“南方国风之音”，因取者不同进入周室而称《周南》、《召南》。显然，二《南》是“南音”北传的产物。

关于“二南”有各种说法。《毛序》说：“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郑玄：“自，从也。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陆德明《音义》曰：“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岐山之阳，于汉属扶风美阳县；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孔颖达亦云：“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于南方。”（以上均见《毛诗正义》）。^[4]关于二《南》名称含义的各种说法实际上并无根本性矛盾。因为“南国”、“南土”或“南方”必然有自己的音乐，即“南音”；而“南音”也必然源自“南国”、“南土”或“南方”。诸种说法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认为二《南》采自南方。因此，二《南》实际上就是“南音”北传的诗乐成果。

关于二《南》采入周室的时间，学者间略有分歧。如，郑玄《毛诗谱》说：“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才之化者谓之《召南》。”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诗。”“武王遍陈诸

[1] 《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3页。

[2]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46页。

[3]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46页。

[4] 《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页。



国之诗，今惟二《南》在矣。”^[1]魏源《诗古微》说：“二《南》之诗，实陈于武王时周、召分陕之后。所采则皆文王之风，实非周、召之化。”^[2]朱熹《诗集传》云：

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礼作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箎玄，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3]

周武王巡守与周公制礼作乐是紧密相联的两个阶段。而周公无疑是从西周武王立国到成康盛世的实力派人物。二《南》在周武王或周成王时采入实际相差不大，进一步区分亦无多大实际意义。对是周武王采入还是周公采入的区分也是如此。即使周公在成王时制礼作乐，其采诗也不会是一个临时的突击行动，在之前的武王时（或者文王时）周室很可能已经开始采风了。周公旦、召公奭是西周初期的实力派人物。采风很可能是周、召二公直接策划。采的诗以周南、召南命名自很正常。

周家采“南音”的目的是制礼作乐的需要。周初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制礼作乐，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多，有取于“南音”是十分必要的。“南音”被采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其最初进入北方周文化的时间。表面看来，采“南音”之前，似乎只是周文化的单向南扩运动，即文王之化自北行南。但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可知，周之德化自北行于南方，实际上是周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一个磨合过程。这是一个文化双向互动过程。既有南方文化对周文化的接受，又有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吸收。毛序屡次强调二《南》诗歌反映了文王之化行于南国的效果，朱熹《诗集传》也说二《南》所采乃“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则周室所采的“南音”似乎并非南国最原始的“南音”，而是南北文化交融后的新“南音”。或者说是原始“南音”的音乐形式与周之政治、伦理等文化思想相互交融的产物。这种新“南音”在北方文化中的传播面是很广的。而且它原来的乐章内容可能比今本《诗经》中的二《南》还要丰富。例如，《礼记·射义》云：

射礼，天子以《騶虞》，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苹》，士以《采芣》为节。^[4]

《騶虞》、《狸首》、《采苹》、《采芣》是周代进行射礼时的乐章。不同身份等级者所使用的乐章不同。四首诗的音乐节奏各异，不同的节奏适合不同身份的人进

[1] 《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第264页。

[2] 《诗古微》，魏源撰，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第61页。

[3] 《诗经集传》，朱熹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49页。

[4]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12页。

行射礼活动。但今本《诗经》的二《南》中并没有《狸首》。郑玄《诗谱》说：“今无《狸首》，周衰，诸侯并僭而去之，孔子录诗不得也。为礼乐之记者，从后存之，遂不得其次序。”^[1]不难知道，音乐的传播必须与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狸首》的不存当是音乐自身与时代社会相互调整的结果。孔颖达《毛诗正义》曰：“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则《狸首》亦当在。”^[2]因此，从《狸首》在周之礼乐体制中的演变也可窥“南音”兴废之一斑。

从上面射礼活动已可见周代各贵族阶层对“南音”的接受状况。又如，《仪礼》乡饮酒礼者，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之礼，“乃合乐《周南·关雎》”；燕礼者，诸侯饮燕其臣子及宾客之礼，“遂歌乡乐《周南·关雎》”。故毛诗《周南·关雎》序说《周南·关雎》“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显然，“南音”在周代社会中的传播面十分广泛，可以说是上到朝廷，下到普通百姓。

第二，周文化南传。例如，《管子·小匡》载齐桓公语曰：

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瓜长、不虞、雕题、黑齿（注：皆南夷之国号也），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3]

齐桓公所说的“牂牁”指的就是贵州。《贵州古代史》说：“这说明齐桓公称霸时，先已有牂牁国。当时齐桓公威震遐迩，周天子派使者慰劳，各国贡献方物，表示尊敬霸主，服从号令，牂牁国也有所贡献，是表示降顺的远邦之一。”^[4]此言不差。但古代贵州对北方政权的降顺肯定不自春秋齐桓公时期始。这充分说明先秦时期贵州诸部族与北方文化的交融在春秋之前已经存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了。到春秋时期，贵州更是完全融入在北方文化圈之内。又如，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说：

滇黔龙土司，本鷩氏也，于周为汉上诸姬。《左氏传》所载罗人鷩人是也。楚灭宋、蔡、罗、鷩四国，俘其宗室，放之南徼，遂成苗、彝，今滇黔之间有宋家蔡家罗家龙家之苗即其裔也。四家之冠裳服饰冠婚丧祭，一秉周礼，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婚姻重媒妁，备六礼，然后成。

再如，田雯《黔书》卷一“宋家”、“蔡家”条曰：

宋家，盖中国之裔。春秋时宋为楚子所蚕食，俘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为夷，即宋宣慰之祖也。通汉语，识文字，勤耕织。男子帽而长襟，妇人笄而短襟。将嫁，男家往迎，女家率亲戚捶击之，谓之夺亲。既归，旦则进

[1] 《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页。

[2] 《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页。

[3] 《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3页。

[4] 《贵州古代史》，周春元等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